
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光 辉 的 业 绩

——试论“左联”的成就及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邵伯周

今年是“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左联”只存在六年(一九〇年三月到一九三六年春),时间不长,却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当然,“左联”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但在一九五七年由于在“左联”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冯雪峰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就讳言“左联”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后来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从极“左”方面无限夸大“左联”的错误,还无中生有,混淆是非,全盘抹煞“左联”的成就,甚至把它说成是什么“黑线”,妄图在文艺界打开缺口,实行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而今,江青一伙强加给“左联”的诬陷不实之辞已经被推倒,但其他一些被搞乱的问题还有待澄清。现在是给“左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的时候了。肯定它的成就,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不仅是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任务,并且是有现实意义的。

—

要正确评价“左联”的成就,就必须正确看待党的领导作用和鲁迅的领导作用。

“左联”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筹备、成立起来的。在成立大会上,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领导工作。“左联”内部有党组性质的“党团”,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周扬等同志先后担任过党团书记。“左联”党团的职权是: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决定,经过中宣部领导的“文委”下达到“左联”,重大事情要同鲁迅商量,在一九三三年年底以前,大都是通过冯雪峰的,以后主要通过吴奚如。

鲁迅在“左联”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左联”的巨大成就是和鲁迅分不开。冯雪峰同志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正确的评述。可是在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时,却有人把冯雪峰同志的这一评述说成:“不但完全是对党和左联的诬蔑,而且也是对鲁迅本人的污辱”^①。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必须加以澄清。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中央宣传部指示冯雪峰,把刚刚经过“革命文学”问题论争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及其他作家团结起来,成立一个革命作家的团体,这就是“左联”。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左联”内部,党的领导作用与鲁迅的领导作用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左联”是党直接领导的，就不可能不贯彻党的路线，“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②。“左联”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筹备和成立的。不久，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这在“左联”的活动中都是有所反映的。例如“左联”成立大会通过的《理论纲领》及以后通过的一些决议，就有“左”的影响。又如“左联”既是一个作家团体，是“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③，通过文学活动来进行斗争的。但“左联”内党组织负责人却“主要的是把左联当作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甚至当作“半政党”^④或“第二党”了^⑤。因而就更多地搞政治活动，如组织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张贴标语等等，忽视了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能。这都是“左”倾路线的反映。但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左联”是在白色恐怖下活动的。因此，党的错误路线也不可能全面贯彻，还会受到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抵制。如殷夫、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就是和何孟雄等共三十多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反对王明“左”倾路线时，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的。

在“左联”时期，共产主义者鲁迅更善于识别并抵制那些“左”倾的东西。例如一九三〇年五月间，李立三约鲁迅会面，要鲁迅发表一个宣言，表示拥护他“左”倾路线的各项主张，鲁迅拒绝了。鲁迅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韧战”、持久战，反对赤膊上阵。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文学月报》（第四期）发表了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以辱骂和恐吓来代替战斗，是“左”倾路线在文风上的反映。冯雪峰看到后很不满意，告诉了鲁迅。鲁迅就立即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严肃地批判了那种恶劣倾向，指出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注重‘论争’”。还有一个例子：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陈赓同志在上海治病，曾会见过鲁迅，向鲁迅介绍了鄂、豫、皖地区红四方面军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鲁迅听后很兴奋，曾打算写一篇描写红军斗争生活的小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但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是完全拥护的。上述例子表明，鲁迅是站在正确路线方面反对错误路线的。在思想斗争和文学斗争方面，鲁迅以“左联”为阵地，娴熟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进行战斗，所向披靡。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使“左联”作家围绕着他、接受他的影响和领导。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成为“左联”的主将而起领导作用。一九三二年底，《文学月报》被迫停刊后，“左联”已经没有自己的刊物，活动更困难了，而鲁迅的领导作用也就更为显著。正如冯雪峰同志所指出的：“鲁迅先生对我们的领导，不是由于一种什么法定的关系，而是像一个老战士带领一批新战士那样，自己走在最前面，同时非常亲切、具体和周到地照顾与教育着新战士”，“在那时候，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只要鲁迅先生不退出左联，不放弃领导，左联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与斗争就能够坚持”。总之，当时对敌人斗争而取得胜利，以左联活动的范围来讲，鲁迅先生的斗争的顽强和他的权威地位实在起了决定的作用。

冯雪峰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年底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以后又参加了长征。一九三六年四月，他受党中央委派从陕北回到上海（这时候，“左联”的负责人已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王明的指示解散了“左联”），向鲁迅和有关方面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鲁迅加深了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信赖。因之，否认鲁迅在“左联”中的领导作用，把冯雪峰对鲁迅在左联中的领导的评述说成

是“对党和对左联的诬蔑，而也是对鲁迅本人的污蔑”，是完全错误的；江青一伙把鲁迅与“左联”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左联”，又把鲁迅架空成为“空军司令”，这才是既诬蔑了“左联”，又诬蔑了鲁迅，并且是别有用心。

在这里，我们还要附带指出：代表党组织与鲁迅联系、并且作为“鲁迅的忠诚学生，又是他的战友”^⑥的冯雪峰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团结鲁迅，组织左翼文学队伍方面，也是有重大贡献的。有人说他在“左联”时期就是“反党分子”^⑦，是极为荒谬的。

二

在政治斗争方面，以鲁迅为主将的“左联”作家，用笔作武器，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文艺总是离不开政治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从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左联”那个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文化革命方面也是这样。“左联”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这个口号本身以及运动的某些实践方面来说，也反映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某些影响。但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导方面来看，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口号，可以理解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这个运动和当时的农村革命，是互相配合的，是两种革命深入的一种，即文化革命深入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左联”有力地揭露并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的罪行。

“左联”初期的几个刊物，如《巴尔底山》、《文化斗争》、《十字街头》等，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鲁迅的著名杂文《“友邦惊诧”论》和《言词争执歌》等四首政治讽刺诗，都首先发表在《十字街头》，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左联”的其他刊物也都贯串了这一精神。一九三三年起，“左联”刊物相继被迫停刊。鲁迅和“左联”其他作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在其他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进行战斗。

其次，“左联”有力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作家、摧残革命文化的暴行。一九三一年四月，鲁迅、茅盾、冯雪峰等编辑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创刊号，就是“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殷夫等“被难同志传略”和他们的遗著，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左联”的《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揭露、控诉反动派秘密杀害革命作家的血腥暴行。《前哨》第二期起更名为《文学导报》（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先后登载了世界革命作家抗议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的文件。鲁迅还先后在国外发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向全世界揭露了中国文坛上鬼魅横行的状况，痛斥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鲁迅还运用各种巧妙的战术来揭露敌人，如在编杂文集时，编入曾经被禁止发表的文章，把被检查官删改过的文章恢复原样，并特别做上记号，以引起读者注意。有些杂文集还加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后记》，如《伪自由书·后记》、《准风月谈·后记》、《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等等，引用大量反面材料，如反动文人的造谣诬蔑、报纸上关于特务捣毁书店和进步文化机构、反动派查禁书目的消息等等，从而使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丑恶面目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再次，“左联”有力地揭露了充当反动派文化“围剿”别动队的所谓“三民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真面目。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除了用反革命暴力这一手外，也来“文艺”这一手。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间，国民党宣传部抛出了所谓“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国民党的组织部（C. C. 系特务）又利用一些文化特务，鼓吹什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妄图用文艺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涂脂抹粉，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叫嚣，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鸣锣开道。于是什么“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在南京、上海地区，一时甚嚣尘上，成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支别动队。对此，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以“左联”的《文学导报》为阵地，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各个方面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彻底剥去了他们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外衣，使他们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总之，我们认为江青一伙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完全抹煞“左联”在政治斗争方面的成就的阴谋，是别有用心；以鲁迅为主将的左翼作家用笔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作斗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是有目共睹的。

三

在理论批评工作方面，“左联”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努力用来解决文艺实践中的问题，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左联”成立后，就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出版理论刊物《文艺讲座》。在“左联”的理论批评工作中，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瞿秋白翻译了恩格斯的《给哈克纳斯的信（论巴尔扎克）》、《给爱因斯特的信（论易卜生）》、列宁的两篇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等论文。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冯雪峰也在“左联”成立前就翻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译文题为《论新兴文学》，署名成文英）。“左联”时期又在鲁迅支持下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出版了十四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一九三二年苏共中央解散了“拉普”，批判了它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总结了苏联文学创作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不久，左联也就把它介绍到我国来。

“左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对我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胡说什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左联”的指导思想。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其实“左联”时期对“别、车、杜”的著作，还翻译介绍得很少，只有鲁迅译的普列汉诺夫写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周扬译的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等很少几篇。因此，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并没有成为“左联”的指导思想；说“左联”对他们的著作注意不够是一个缺点，倒还恰当一些。

“左联”的《理论纲领》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也反映了“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某些不足之处。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一个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决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问题，指导“左联”工作的战斗纲领。

“左联”非常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做了一些探索。文艺大众化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文艺更好地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当时

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所进行的探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左联”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评论作家作品，也是有成绩的，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肯定了鲁迅杂文的巨大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指出了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有一个质的飞跃，后期鲁迅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这都是完全正确的。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序文》捍卫了鲁迅这一面光辉的旗帜。但《序言》用“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来概括鲁迅早期、前期的思想是不确切的。鲁迅的《论“第三种人”》、《小品文的危机》、《拿来主义》等杂文和为《丰收》等作品写的序文，都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

谈到“左联”的理论批评工作，我们认为还应对一九三二年间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重新作出评价。这次论争是“左联”与自称为“自由人”的胡秋原、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之间展开的，是一次影响很大的论争。但一九五七年以后，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和一些论述“左联”的文章中，对这次论争的性质和冯雪峰在这次论争中的作用，都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评述。例如把这一场论争说成是“敌我矛盾”，是文化战线上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说冯雪峰在这一场论争中就“暴露”了“反党立场”，“代表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等等。^⑩

其实苏汶和胡秋原，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所不同。鲁迅当时对他们就是区别对待的。他认为胡秋原是“在指挥刀的保卫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⑪。冯雪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正确地指出：胡秋原的理论是“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不管他自己主观上怎样，事实上“他已经是敌人冲锋队里的一员了”^⑫。至于苏汶，鲁迅并没有把他看做敌人。何丹仁（冯雪峰）更明确指出左翼应该与他“建立友人的关系”^⑬。这场论争虽然是由胡秋原挑起，但主要是在“左翼”作家与苏汶之间进行的，围绕着“文艺自由”问题，接触到文艺的阶级性和武器作用问题，艺术的价值问题等等。通过论争，“左联”方面对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有所认识的。冯雪峰的《并非浪费的论争》、《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给这场论争作了基本上是正确的总结。最后苏汶也发表文章表态，承认了自己的某些错误观点。苏汶后来变坏，那是另一个问题。笼统地把这一场论争说成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正确的，说冯雪峰当时的立场是“反党立场”，更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左联”的理论批评工作，虽然受到“左”倾路线和苏联“拉普”的影响，犯了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但那是次要的。就主要方面来看，都是取得光辉成就的，与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相比较，已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四

评价一个文学团体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它在发展创作方面所起的作用。

“左联”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团体，在它存在的六年间，先后办了《北斗》、《文学月报》两个发表创作（与理论批评并重）的刊物，前者出版了八期，后者出版了六期。尽管时间短，发表作品不多，它还是团结了一部分有影响的作家，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的。一九三二年底，“左联”的各种刊物先后被迫停刊后，“左联”作家除自己坚持写作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方式，支持进步作家编辑期刊、副刊、丛书，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鲁迅后来收集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集子中的那些“匕首和投枪”般的杂文，就是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鲁迅还曾担任《文学》的编辑委员，给予很大的支持；茅盾也经常为它写稿。与此同时，鲁迅还

支持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给巴金编入《文学丛刊》第一辑。

总的说来，在“左联”时期，由于鲁迅、茅盾和其他作家的努力，创作也是有很大收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左联”作家的视野比较广阔，工人、农民、小市民、工商业家、各阶层的知识分子、革命工作者等各种人的生活受到普遍的注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农村破产、农民自发的或自觉的起来斗争；城市的工人运动；民族工商业的困难重重，乃至被迫破产；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觉醒，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映，从而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与历史动向。

“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及“左联”初期创作中的那种公式化概念化逐步得到克服，作品的现实主义得到了加强。鲁迅的《二心集》等几个杂文集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珍品。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提出了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指出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作家自觉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进行创作所获得的重要成果，是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丁玲的《水》、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田汉的《梅雨》等，比他们早期的作品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文学新人叶紫的《丰收》、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艾芜的《南行记》和张天翼的作品，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由于作家们自觉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进行创作，塑造出了一些杰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典型形象，如吴荪甫、老通宝、阿多、林老板、张进德、李杰等等，充实了“五四”开创的我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画廊，标志着我国新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左联”作家们更自觉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以强烈的革命精神反映生活，鼓舞了广大读者，从而把我国新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还有不少非“左联”成员的进步作家，也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故未涉及）。

我们今天来纪念“左联”，就要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端正思想路线，既要充分肯定它的成就，正确认识和评价鲁迅所起的领导作用；更要吸取它的教训，彻底清除极“左”路线在文艺界的流毒，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影响，为进一步发展新长征中的文艺运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努力奋斗。

注：

- ① 何家槐：《继承左联的革命传统，发扬左联的战斗精神》，《文学知识》1960年3月号。
-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61页。
- ③⑤ 赵浩：《周扬笑谈历史功过》。
- ④ 冯雪峰：《回忆鲁迅》。
- ⑥ 朱穆之：《在冯雪峰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7日。
- ⑦⑧ 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
- ⑨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 ⑩ 洛阳：《并非浪费的论争》，《现代》第二卷第三期。
- ⑪ 丹仁：《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现代》第二卷第三期。